

汪曾祺生前没有料到自己的重要价值,他的学识与文笔之好,同代人也一时难以描之。我觉得他生前是寂寞的,能够与其深聊的人不多。想起来我与他的几次交流,都在浅的语境里,后来感到可惜的是,没有很好理解他的思想,以致当年请教的问题都非本然之所。在他去世多年后,自己写这本书,其实是在补课。

据说当代作家身后,作品再版次数最多的,就有汪曾祺。这个现象说明他的别致,其人其文,乃文坛上的明珠。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学问家,但不都是书本的知识,还有生活的道理。在其作品里,这些学问都以很东方的方式传达出来,且又有现代主义的背景在内里。我们看他谈及历史掌故与古代文章,其眼光往往还在一般学者之上。对语言学、文学史的理解,都有专业人士少见的意识。但他没有把这些学究化,而是在诗意与风俗画的感性描绘中,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来。而且,常常悟出生活里的理趣,那些我们认为平常的存在,经由其笔,便有了神异之调。

我当年写一点关于他的文章,想要寻找背后的那些东西,于是连带出同时代的一些人与事,在比较中思考一点审美的内容。这些都是远远的旁观,遗漏的也有一些细节,其中不乏潦草的地方。对于其思想的透视不清,非不为也,而弗能也。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一下子说清,说明他远远走在我们的前头。

汪曾祺的好,不仅仅是衔接了传统写作的趣味,重要的是对于自己生活的诗意的总结。我们看他的文字那么美,其实掩盖了许多伤感、忧虑与无奈。但他不是甘于陷在灰暗里的人,而是在自己的园地里自得其乐的自信者。而那种自得其乐,不是麻醉自己,泯灭个性于寒冷之中。他的文字绵里藏针的地方甚多,对于伪道学和平庸的思想颇多揶揄,那些静谧的辞章里晃动的火苗,温暖我们之余,也驱散了缠绕着思想的种种魔影。在一个特殊时代而创造出逆时代风气的审美哲学,这是他的贡献。我们对此总结得远远不够。

通常的看法是,在其作品里看到世外桃源般的美丽,好像沈从文世界的另一种延伸。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假象。他对于世态炎凉的体味,绝非常人可以察之。那些对于旧时代的不幸的描摹,有哀凉于斯,而嘲讽的力量不亚于左翼文人。只是那目光的温和遮掩了阴影,我们不易察觉更深的痕迹。他写军阀的残酷,描述百姓的苦楚,以及寻常之人的生命体验,不在一般文人的套路里,反土大夫的一面也是有的。那就是不做儒家理论的注脚,而在个人主义的精神里寻觅人性的亮点。他在俗人俗语里总能发现超然之美,又会于枯燥中点染精神的色泽,从传统文化的余痕里提炼现代人的趣味。于是浑浊里有莲叶



读懂汪曾祺

孙郁

晃动,死灭中却烛光闪闪。这其实已经不同于废名与沈从文,走出了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汪先生的存在,带来了许多稀少的元素,这在鲁迅那代人属于常识的东西,而当代作家多缺少类似的基因。例如,他的作品常常有寺庙生活的描述,和尚、尼姑、居士在其小说里总能有另外的寓意。他不像苏曼殊那样在辞章里熏染佛音,而是看到世俗佛教里的中土文明的本然之色。鲁迅最早在《我的第一个师傅》里写到世俗化的佛教中人的状态,诠释了寺庙间的世俗之景。汪先生是接着鲁迅继续走下的人物。《受戒》《慧明》写庙宇内外的人生,我们感慨的不都是宗教生活,而是宗教影子里的人性之旅。那些惆怅的苦旅里的微明的光,那么动人地暖着我们的心。汪曾祺于此,看出了人间世最为神奇的美质。

他曾经说自己是一个儒家,其作品也确实有儒家温和、悠远之味。但那不是失真的儒家,也非马一浮的儒家,而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沐浴过的儒家。这中和之音与冲淡之曲,也有对于人性的拷问,带着清灵的爽意,引人到自审的高地去。不再观念先行,而是从经验里提取爱意。他剔去了鲁迅的残酷,远离了矛盾的隐喻,开辟出当代审美的新途。那些被许多新文化人压抑的传统,被一点点召唤出来,于是现代白话与明清白话的书写,已不再是断裂的对立者。我们古老的文明与现代的鸿沟,被慢慢抹平了。

批评汪曾祺的人,以为其格局不大,革命话语在他那里被稀释了。我们如果细细分析其文本的内蕴,往往比神往重大主题的作家要丰富得多。简单化与概念化在他那里消失了。反讽、静观、冷思都在词语的背后游动,对于存在的描述,也有幽默有趣之处,且显出冷峻后的超脱。《聊斋新意》集中体现了他于流俗里透视人性的智慧,这给他的作品带来复杂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反本质主义的作家,就审美的突围而言,他的存在比先锋作家可能更为重要。

被读者持续认可的作家,才真的活在自己的母语里。汪先生不仅仅打捞了失去的文明之光,也恢复了汉语的尊

严,当代作家能够体味母语气味和哲学意味的人不多,先生独得其神,且以百姓之趣为之,在看似平淡之间,已有层叠不已的气象。弹指之间,山河变色;一语一出,百卉悉开。这是鲁迅之后重要的精神存在。时间越久,他的价值便越发清晰地凸显出来。

他的文字接续了千百年的文脉。节奏、章法、意象,都在金石之趣里浸泡过,宋明文人的文章之道,以一种日常的方式儒雅地涌动出来。他的美不在那些刻意的词采选择上,而是体现在口语与文言的变奏中。粗看起来,平淡如水,而整篇视之,高低起伏,阴阳回旋,寂寞之处突现奇音,细微之中有着深的寓意。百年的小说家,有此种功底者,惟二三子矣,先生于荒漠里独拓出审美的绿地,至今让我们感到文章的爽意。

这其实不仅仅是审美的突围,也有人生哲学的雨露。这样的书写有他对于人生的特别的态度。有意回避无序化的谈吐,不再以灰色涂抹人生之境,那自然不及卡夫卡的深度,也缺了鲁迅的苍凉之气,但却开启了寻常之人的爱意之门。那门的背后不都是枯燥与无聊,天地之间,是初露的曙色,燥热里流出夏日的清凉。在细小的世界看人间万象,未尝不能有酣畅之咏。那些醉心于宏大叙述的人,精神的高墙一个个坍塌下来,而他却于幽微里折射出纷繁的气象。对于研究者而言,其审美理念真的改写了文学的地图。

当代文学已经有了七十余年的历史,作家之多已经让我们眼花缭乱。如果不是汪先生的存在,贯通古今的写作便会中断了。这使当代文学有了与民国文学对话的资本,而且连接了现代性的版图变得完整了。民国文学是晚清文化的产物,而当代文学除了红色传统外,也含有民国文学的基因,后者的代表就是汪曾祺先生。而且他的存在也告诉人们,当代文化其实也是在民国文学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民国之后,新生的与固有的文学意象,都在汪曾祺那里有趣地保留。他给我们的教益,今天还没有被很好地品味。

没有想到《闲话汪曾祺》这本书很快会再版,这是借了汪曾祺热的推力,真的是与有荣焉。这几年的大学论文里,谈及汪曾祺的越来越多,有的已经很有深度,深觉自己多年前的文字乃过时之咏,只是凑些热闹而已。我们这些喜欢汪曾祺的人,愿意为其传播努力再三,实则也是自我的洗礼。如果因了此书,有人能够再去重读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那么吾愿足矣。

(本文为作者所著《闲话汪曾祺》再版自序,刊出内容略有删节、调整,标题新拟。)



行走天山南北(二)

地下运河坎儿井

李显坤

的是,一望无际的盆地戈壁间却分布着一片片充满生机的绿洲。

如此干旱的戈壁为何能绿意盎然?水源从何而来?答案是来自古代吐鲁番人民用智慧创造出来的坎儿井。

在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西部的喀拉乌成山,春夏时节,这些天山山脉有大量积雪融化,与雨水一道流出山谷,很快渗入戈壁地下变为潜流,积聚日久,使戈壁下面含水层加厚,形成储量庞大的地下水,为坎儿井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人们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这一荒漠地区特殊的灌溉系统,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

清代萧何《西疆杂述诗》中有一首言及坎儿井:“道出行回火焰山,高昌城郭胜连环。疏泉穴地分浇灌,禾黍盈盈万顷间。”点明“疏泉穴地”是坎儿井这一水利工程的最大特点。坎儿井由竖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和涝坝四部分组成。首先在地面上高至低打下井口,将地下水汇聚;然后,在井底修通暗渠,待地下水到目的地后引出地面,这样也保证了地下水不会因炎热、狂风而被蒸发或污染。最后,建涝坝蓄水以供人使用。

手摇辘轳,畜力辘轳和暗渠是坎儿井的主体。在挖掘暗渠时,吐鲁番人民发明的油灯定向法令人赞叹。这是巧妙运用了两点成线的原理,用两盏油灯确定暗渠挖掘的方位,并且能够确保暗渠的顶部与底部平行。具体操作中,施工者只要始终挖掘自己的影子,就可以保证方向不发生偏离。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古代,劳动人民能够想出如此妙招,不得不令人感佩其聪慧和巧思。

坎儿井就是这样引来了天山上的冰雪融水,而且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一举成为养育吐鲁番儿女、灌溉万亩良田的生命线。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上世纪30年代就曾道:“坎儿井流过的地方,果木染绿了荒原。”

新疆大约有1600多条坎儿井,多集中于吐鲁番盆地,达1200多条,总长超过5000公里,纯然一条长度近乎长江的地下运河,当之无愧能够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

从坎儿井暗渠流出的水,不易被污染,加之经过千层沙石自然过滤,实际已成为天然矿泉水,富含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当地居民中饮用此水的百岁以上老人比例高,因此,素有“葡萄和瓜果之乡”称号的吐鲁番还有“中国长寿之乡”的美名。

暗渠里清凉的水一直流淌着,没有泛起水花,但心情始终激荡着的杨教授深有感触地说:

“坎儿井完全是地下运河,是人定胜天的实例。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固然伟大,但毕竟不似坎儿井,纯粹是出于人民高度自觉地为改变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而战的一种明智之举。这简直似孙悟空手中的法宝,一举把火洲变成了绿洲。这里流淌着的哪里是井水?在我眼中,就是洒向干渴大地的甘露,就是供给大地肌肤的血脉,更是从古代流淌到当代的智慧之水,足以成为人类向严酷自然勇敢挑战的胜利标志和里程碑……”



沽上丛话

李显坤

由高至低打下井口,将地下水汇聚;然后,在井底修通暗渠,待地下水到目的地后引出地面,这样也保证了地下水不会因炎热、狂风而被蒸发或污染。最后,建涝坝蓄水以供人使用。

进入吐鲁番盆地后,我便手指戈壁滩上纵横着的一连串的圆土包,向杨教授卖起了关子,结果可想而知,他没能猜出来。

听了我揭晓的结果,杨教授很是惊讶,新疆就是这样朴实无华,一项伟大的工程,竟然是以毫不起眼的样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然,我并没有直接带杨教授到这样的坎儿井边参观其内部结构,我们去的是吐鲁番市亚尔乡新城西门村的坎儿井民俗园。

坎儿井就是这样引来了天山上的冰雪融水,而且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一举成为养育吐鲁番儿女、灌溉万亩良田的生命线。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上世纪30年代就曾道:“坎儿井流过的地方,果木染绿了荒原。”

新疆大约有1600多条坎儿井,多集中于吐

鲁番盆地,达1200多条,总长超过5000公里,纯然一条长度近乎长江的地下运河,当之无愧能够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

从坎儿井暗渠流出的水,不易被污染,加之

经过千层沙石自然过滤,实际已成为天然矿泉水,富含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当地居民中饮用此水的百岁以上老人比例高,因此,素有“葡萄和瓜果之乡”称号的吐鲁番还有“中国长寿之乡”的美名。

暗渠里清凉的水一直流淌着,没有泛起水花,但心情始终激荡着的杨教授深有感触地说:

“坎儿井完全是地下运河,是人定胜天的实例。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固然伟大,但毕竟不似坎儿井,纯粹是出于人民高度自觉地为改变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而战的一种明智之举。这简直似孙悟空手中的法宝,一举把火洲变成了绿洲。这里流淌着的哪里是井水?在我眼中,就是洒向干渴大地的甘露,就是供给大地肌肤的血脉,更是从古代流淌到当代的智慧之水,足以成为人类向严酷自然勇敢挑战的胜利标志和里程碑……”

下了十几级石阶,进入100多米狭长的地下参观通道,却是阴凉、干燥的空间,一股幽远的古风徐徐拂面。不远处传来细微的潺潺流水声,如一位温柔的女子在述说着一个故事,语调轻柔动听。一条窄长的水沟里,清澈透亮的汨汨水流顺着一定的坡度欢快而下。

杨教授侧身掬了一把沟水,忍不住咂嘴:

“好冰凉的水啊!”我接过话头:“能不凉吗?这里流动的可都是雪山的融水呀。”

“火洲”吐鲁番是我国最干旱少雨的地方。吐鲁番盆地年降水量仅有15毫米,但年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以上。然而神奇

的,当代作家能够体味母语气味和哲学意味的人不多,先生独得其神,且以百姓之趣为之,在看似平淡之间,已有层叠不已的气象。弹指之间,山河变色;一语一出,百卉悉开。这是鲁迅之后重要的精神存在。时间越久,他的价值便越发清晰地凸显出来。

他的文字接续了千百年的文脉。节奏、章法、意象,都在金石之趣里浸泡过,宋明文人的文章之道,以一种日常的方式儒雅地涌动出来。他的美不在那些刻意的

词采选择上,而是体现在口语与文言的变奏中。粗看起来,平淡如水,而整篇视之,高低起伏,阴阳回旋,寂寞之处突现奇音,细微之中有着深的寓意。百年的小说家,有此种功底者,惟二三子矣,先生于荒漠里独拓出审美的绿地,至今让我们感到文章的爽意。

这其实不仅仅是审美的突围,也有人生哲学的雨露。这样的书写有他对于人生的特别的态度。有意回避无序化的谈吐,不再以灰色涂抹人生之境,那自然不及卡夫卡的深度,也缺了鲁迅的苍凉之气,但却开启了寻常之人的爱意之门。那门的背后不都是枯燥与无聊,天地之间,是初露的曙色,燥热里流出夏日的清凉。在细小的世界看人间万象,未尝不能有酣畅之咏。那些醉心于宏大叙述的人,精神的高墙一个个坍塌下来,而他却于幽微里折射出纷繁的气象。对于研究者而言,其审美理念真的改写了文学的地图。

当代文学已经有了七十余年的历史,作家之多已经让我们眼花缭乱。如果不是汪先生的存在,贯通古今的写作便会中断了。这使当代文学有了与民国文学对话的资本,而且连接了现代性的版图变得完整了。民国文学是晚清文化的产物,而当代文学除了红色传统外,也含有民国文学的基因,后者的代表就是汪曾祺先生。而且他的存在也告诉人们,当代文化其实也是在民国文学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民国之后,新生的与固有的文学意象,都在汪曾祺那里有趣地保留。他给我们的教益,今天还没有被很好地品味。

没有想到《闲话汪曾祺》这本书很快会再版,这是借了汪曾祺热的推力,真的是与有荣焉。这几年的大学论文里,谈及汪曾祺的越来越多,有的已经很有深度,深觉自己多年前的文字乃过时之咏,只是凑些热闹而已。我们这些喜欢汪曾祺的人,愿意为其传播努力再三,实则也是自我的洗礼。如果因了此书,有人能够再去重读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那么吾愿足矣。

(本文为作者所著《闲话汪曾祺》再版自序,刊出内容略有删节、调整,标题新拟。)



敬画孙其峰先生

(漫像)

左川

做人学为要“知足、知不足、不知足”。这是104岁中国书画大师孙其峰先生一生遵循的准则。

癸卯年春 左川

第五
三
四
期

满庭芳

《黑猫白猫》:

荒诞故事背后有深思

王泽一

一个角色。当他打开三百页的剧本时,才发现自己的台词只有一句话,即便是这样,他每天也反复练习。可能是人生中第一次出演电影的原因,库斯图里卡在拍摄现场紧张得要命,多年后他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感觉当时紧张的心脏一分钟能跳三百次。”

之后,库斯图里卡为了继续在电影事业上有所发展,专程赴布拉格留学。学成归来后,凭借《爸爸出差时》和《流浪者之歌》这两部作品在国际影坛初露锋芒,并且受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导演课程。在教学期间,库斯图里卡偶然看到了一位美国学生

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略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又向华北逼来。北平的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捐助活动不得不停止,转入分散状态,于是天津租界内出现了古今中医诊所。有叫古人的吗?有这样开药方的吗?无论病轻病重,他开的药方一律不超过九味药。这是哪一路中医药方?一直到现在,天津人好说天津故事多,古今中医诊所就是光彩故事中的一个。

古今原名关德纯,满族,生于沈阳长于沈阳,自小家贫,边打工边求学,总算熬出一个师范专科学校的学历。凭这个学历,他走上三尺讲台,做个月月有工资的小学教师绝对不成问题,能苦尽甘来。但他不这样做,而是继续边打工边免费的贫儿学校。如果有了捐款,还可以在中午给贫儿一点吃食。如果贫儿病了,能够开个药方,帮助贫儿缓解病痛——他自学成才,成了能治病的中医,也是只开九味药的根本原因。他的本领太惊人了。

当时在沈阳青年会任总干事,后来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情报战线上作出杰出贡献的阎宝航,闻讯前来拜访关德纯,惊为奇人奇事。除了给予关德纯及贫儿学校一定的帮助,阎宝航更为重要的帮助是介绍张学良前来参观,张学良十分惊讶,捐了一笔巨款,贫儿免费学校成了沈阳的一张亮丽名片。

“九一八”事变爆发,贫儿免费学校无法继续了,关德纯含着眼泪离开了沈阳。他到了北平,想再见张学良一面,但当时张学良躺在烟榻上,许多重要的人物都见不到他,更别说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贫儿学校校长了。关德纯把一封信寄给了张学良,他直言直语,说像你这样国仇家恨系于一身,应当振作起来。据说张学良看了一遍又一遍,放声大哭。劝张学良烟,关德纯是第一人。

关德纯最关心的还是他贫儿学校的学生,他们失学以后,又怎么成长?他在沈阳还有亲友,就找他们打听这些学生的下落,这些失学的贫儿当然前途无望,他们想念爱护他们的校长,也在寻找他。一来二去,古今中医诊所前就有了衣服不整、面黄肌瘦的青少年找来。关德纯只靠诊所讨生活,养活不了这么多吃饭的人,何况还无法让他们上学呢。关德纯就和学生们说,现在救国第一,革命第一,你们愿意到解放区去吗?据说,三三两两先后共有七个长大的贫儿走进了解放区,后来都成了挑担子的干部。